

领导干部要树立效果导向思维

□ 周文彰 史 蕊

无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就在于抓落实、求实效。因此，一个清晰的认识是：效果是硬道理，凡事都要讲求效果，领导干部要树立效果导向思维。

明确一个认识：效果是硬道理

效果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那里，效果就是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体现在各方面的发展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因此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真是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激励着我们从那时起始终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效果是人的行为所要追求的目标，一切实践活动，比如生产活动、科研活动、教学活动、医疗活动等，都要讲效果。打一个比方，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而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因此，做任何事情，最终都要让效果说话。比如，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发展效果的最终体现。

因此，现在一直强调改革发展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提出决不能把一个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不能到了时候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为此，我们积极动员全党全国社会力量，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决心最大、规模最大、举措最得力的反贫困行动，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即使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党中央依然召开决战脱贫攻坚座谈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确保今年底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认准一个前提：做正确的事才能有好效果

毫无疑问，凡事都要讲求效果的“凡事”，是指“正确的事”，做事先要做对事。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在《有效的主管》一书中提到“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和“做正确的事”两个命题，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当然要正确地做事，但更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是做事的方法或手段问题；做正确的事，是做事的方向或原则问题。显然，做正确的事远比正确地做事重要；如果做的事本身不正确，那么，做事的方式越正确，犯的错误就越大，效果也就越糟糕。

今天，对领导干部来说，做正确的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去做事，从

实际出发去做事，做“三个有利于”的事；对个人来说，就是要做岗位职责要求做的事、对社会有利的事、高雅健康的事。只有在做正确的事的前提下，效果才是值得追求的。

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乱作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没有做正确的事。乱作为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性的原因是背离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有鉴于此，党中央反复强调谋事要实，就是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事。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我们过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要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实现好的效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基础和前提。

明白一个道理：效果还取决于正确地做事

当然，要达到一定效果，一定要把握时机，选准措施，讲究方法等，这些都属于正确地做事的范畴。

首先，即使是做正确的事，也要把握好时机。过于超前或过于滞后，再正确的事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其次，即使是做正确的事，也要选准措施。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措施是不是有效。措施配套不当，再正确的事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比如，我们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就十分重要；改善营商环境，就要出台系列举措等。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很快见效，就在于封城、宅家、停工、对口驰援、建方舱医院、加快应急物资生产供应等一套“组合拳”措施非常有力。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的技术工具，使我们有了更快捷和更便利的措施或手段来获取资讯、建设数字政府，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从而提高了各级政府的治理效能。

最后，即使是做正确的事，也要讲究方法。有些事收不到好效果，不是事情不正确，而是方法不对头。领导方法、管理方法、群众工作方法、思想工作方法、决策和政策的实施方法等，永远是领导干部必须讲究的重大问题，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我们强调方法，但对方法的选择绝对不能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比如，损人利己的方法、坑蒙拐骗的方法、弄虚作假的方法、欺行霸市及倚强凌弱的方法等，都是不可采用的。我国古代就强调“五常”，即人人都必须具备五种基本的品格和德性，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积极意义。现时代，科技推动经济腾飞，市场更加开放，竞争环境更加透明、公正，自由选择权更大。我们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在什么岗位，都要做到立身不

忘做人之本，把修身立德作为终身的必修课。这是一个人立足并获得长久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最终走不长远而且也会伤害自己。尤其是对于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来说，方法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与党和国家的形象，因而更需注重方法的选择问题。

学会一种思维：效果导向思维

如果把以上所述归结为一点，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一种思维，也就是效果导向思维。只重愿望，不重效果，只重过程，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效果，最后事与愿违，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缺少的就是效果导向思维。

效果导向的对立面是形式导向——这是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形式主义的要害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求表面不顾实质，只图虚名不求实效。从某种程度上说，效果是硬道理应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是：凡事都要讲求效果，应把效果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搞任何没有实际效果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用实际效果作为评价工作成败得失的尺子。比如，如果不考虑效果，用形式主义去抓经济工作，经济上不去；去防治污染，环境好不了；去对待民生，民生不可能改善；去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老百姓肯定没有安全感。树立起效果导向的思维方式，抓工作的动机、目标、思路、方法、效果等，立刻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同时，效果导向必然要求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坚持问题导向，因为影响效果的都是问题，包括内部问题或外部问题、关键问题或枝节问题、战略问题或战术问题、多个问题或单一问题、长远问题或暂时问题等。只有发现问题才能找到效果不好的症结，只有解决问题才能出现好的效果。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当然也是追求效果的行动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成效突出，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扭住深层次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精准发力。

效果导向似乎要求我们专注于结果，而不注重过程，但实际上，重视效果对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要求明确目标，围绕目标展开活动，同时还要求我们注重选择恰当的措施和方法去实现目标。问题导向似乎要求我们重视过程，没有强调效果，但重视过程就等于为效果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因此，效果导向和问题导向是相辅相成的。以从严治党、加大反腐力度为例，问题指向官员腐败、官场风气，目标是建设一支对党忠诚、执政为民的干部队伍，效果导向和问题导向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有机结合在一起。

领导科学

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

□ 张丙宣

理技术，它通过增量式赋权和重构式创新，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和效能。

增量式赋权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功能之一。技术都有赋权的功能，数字技术的赋权是普遍的增量式赋权，它既向技术开发商赋权，提升生产效率，强化产业协作，创造新价值，也向用户赋权，增加用户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和渠道。数字技术让零边际成本成为现实，其增量式赋权并不因为向一部分用户赋权就剥夺了另一部分用户发展的机会。通过增量式赋权，数字技术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持续提供强大的动力，也将我国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的制度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提供新动能。

重构式创新是数字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数字技术通过水平和垂直层面整合上下游需求与供给，创造系统性解决方案。在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生产、生活、交通、金融、商业等领域已经或正在经历重构式创新，产生了平台模式。平台模

式成为驱动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同样，数字技术正在基层重组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体制机制，将传统的行政部门整合为综合服务平台，推动治理从部门向平台转变，平台治理正在成为新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原则与路径

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应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目标导向，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治理体制，提高全要素综合治理能力。

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治理能力，需要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判断，秉持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成为数字治理的受益者。二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三是突出公平正义。彰显制度及其效能的公共性，让技术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存在的短板和脆弱性，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以至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家层面强调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各级政府快速反应，纷纷把构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上议事日程，展开密集调研，力求尽快出台和实施切实可行的重构方案。构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达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要求，就需要从体制、机制和预案等多个角度切入，从长远的、全局的、系统的角度，将之放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框架内去统筹考虑。

应该说，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是摆在各级政府和各界面前的共同课题，也成为考验各级政府执政理念和能力的磨刀石。对此，应坚持创新思维，综合体制变革、观念变迁和社会力量，探寻一个政府主导，社会、企业、民众广泛参与共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路径和方法。

构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是关系国计民生，关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揽一切。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必须满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的需求，不仅品类繁多，数量庞大，且不同品类的物资对存储环境、维护保养、存储时间等都有不同的专业要求。因此，为确保应急物资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还需要形成运输配送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体系。如果完全由政府包揽一切，不仅财政不堪重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不合理配置，也容易使公众形成对政府过度依赖的惯性心理，淡化自身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所以，政府应善于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甚至运用法律手段，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在政府统筹主导、规范规划的大局中共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将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做；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赋能，优化放管服

改革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通过多种方式，给为应急物资保障作出贡献的社会力量政策支持和表彰奖励，营造干事创业氛围，赋予荣誉认可，弘扬正气，树立榜样，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应急物资保障事业，促进良性循环。

从市场角度来说，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物资十分丰富，市场流通和配套服务能力十分发达。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列入应急储备目录的物资，在生产与流通领域都是海量的存在，特别是一些专业装备，如医疗器械、施工机械、供水供电和通信设备等，也在各专业机构、企业中大量保有，正常使用。所以，我们应以平战结合的思维，想办法通过机制创新，采用国家储备与社会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与生产能力、采购资金储备相结合的模式，通过法治机制和契约方式，让正常存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物资装备，在关键时刻可以有效转化为应急保障物资，让应急物资依法储备、依令调拨、高效配送，成为协约企业和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定职责，并通过践约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这将有利于大幅度降低财政的承重压力，并有效规避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合理等风险，也有利于在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和运营的同时，强化应急消费市场的培育，推动应急产业有序长效发展。

从社会角度来说，一是应通过强化科普宣传、政府示范、财政扶持、社会与企业资助和立法建规等组合拳，积极引导和鼓励民众，增强自我防范和安全消费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和家居安全工具使用意识，如家庭防灾应急包、个人应急防护用品、生活必需品等，做到以民众、家庭储备为主，并逐步内化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为。二是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机构，积极推出家庭安全责任保险产品，逐步形成完整的应急预案联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根据不同灾种和灾害级别，自动生成应急物资需求清单、物资信息、采购流程和使用指南，真正实现关键时刻找得到、调得出、用得上。

从应用技术角度来说，需健

□ 翁冠雄 王邵强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怎么建

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种、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一是有必要尽快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应用领域、不同灾种的特殊需求，编制修订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指导目录及标准，以符合应急保障的实战需求。二是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三是对短期可能出现短缺的物资供应，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四是尽快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的应急物资保障信息服务平台，让社会成员随时可以通过平台获得所需信息和帮助。五是推动各级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应急物资储备，通过试点，摸索经验，逐步将民间储备纳入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众志成城共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局面。

公共安全

一个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是良好制度产生的结果。不管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都需要持续发挥制度优势，持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然而，与以往依赖于单个领域、部门、政府层级的制度优势不同，新时代需要创新治理理念，开发治理的新技术新工具，将多领域多部门多层级的制度优势重组，转化为全要素综合治理能力。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变。数据正在成为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信息化和数字化正在成为创新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数字技术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

什么是数字技术？它以数据为基本要素，运用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以及各类智能传感器收集数据，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边缘算法、区块链等工具存储、分析、处理和传递数据，通过高效的云服务、公共数字平台、开放的深度学习框架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数据基础设施，实现具体问题与治理主体、解决方案的智能匹配，达到精准精细高效治理的目的。简言之，数字技术是智慧的治

理”等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应用模块将取代部门，成为基本的治理单元，部门的职能和权力被重组到不同的应用模块中。一个部门可以参与多个模块，一个模块包括多个部门的职能。为此，应该运用数字技术开发应用模块，促进技术开发与部门业务的深度融合，并将模块算法化，算法代码化、软件化，通过算法创新，不断拓展应用领域，不断提升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治理能力和效能。

四是持续完善治理规则，营造良性治理生态。治理规则是平台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决定了模块能否持续创新、平台架构能否持续优化。平台的治理规则强调向应用模块而不是单个部门赋予更多的自主权，鼓励部门在应用模块中开展协同创新，不断优化模块的功能。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使他们成为平台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平台治理规则要求分享决策权，调控激励以促进不同主体目标的兼容，营造良性的治理生态，为各类问题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

